

主编 李大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一辑）

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

〔俄〕普列汉诺夫 著 张仲实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一辑）

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

〔俄〕普列汉诺夫 著 张仲实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哲学)

ISBN 978-7-5520-1744-1

I. ①社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—研究 IV. ①B0-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13号

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 × 90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744-1/B.155

定价: 78.00 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「俄」普列漢諾夫 著 張仲實 譯

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譯者序言

這幾年來，國內出版界關於各科基本知識的通俗讀物，出版的很多，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可是跟着來了一個缺點，那就是內容的公式化。你不論揭開那一本小型的讀物，都可看到，內容和寫法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。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要補救這個缺點，只有多多介紹世界的古典著作，加深研究工作，這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

在這一動機之下，我便首先介紹了普列漢諾夫的這部著作。

普列漢諾夫（G. V. Plekhanov, 1856——1918）是俄國有名的學者，他是俄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。雖然他後來在政治上做了少數派的領袖，背叛了革命的立場，但是他早年關於哲學和歷史唯物論的許多鉅著，是千古不朽的名作。伊里奇雖是他的政敵，但是關於他的有些著作的評價，却評的很高，他在革命以後說道：

「……不研究……正因為是研究……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的一切著述，那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、真正的共產主義者，因為普列漢諾夫的著作，乃是一切國際的加爾學說文獻中的最佳者。」

「……據我的意見，勞工國家應當要求哲學教授知道普列漢諾夫關於加爾學說的闡發，而且會把這種知識傳授給學生。」

本書原名“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rxism”乃是普氏最佳的著作之一，雖然內邊有好多錯誤（如關於費爾巴哈哲學的評價、地理環境的作用等，詳見各條的註釋），但是全書却很有價值，牠以很通俗的方式，關於新哲學的各種基本問題（如辯證唯物論、歷史唯物論）都一一給了個簡單扼要、明白而有系統的闡釋。一九二一年伊里奇曾指出，普列漢諾夫闡釋新哲學問題的各种書籍，應列在研究新哲學的必要的教科書以內。本書就是屬這幾部書籍當中的一種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價值來。原文係於一九〇八年出版，後來曾屢屢再版過。在十月革命以後，曾列在馬恩學院

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叢書以內，也再版過好幾次。本書就是根據這個叢書本一九三一年增訂第四版譯出來的。

書末名詞和人名注解，爲馬恩學院所加。這對於初攻社會科學的人是很必要的，所以，譯者也照樣把它譯了過來，想來讀者定是歡迎的。凡書中名詞或人名下有加（*）符號的，在索引內都有，即可按筆劃去找尋。

譯者學識淺陋，內中有譯得不妥的地方，尙希讀者予以善意的指教是幸！

譯者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乍雨乍晴的滬濱

目次

譯者序言

一 序言	一
二 馬恩哲學的研究資料	三
三 存在與思維的關係	七
四 主體與客體的統一	一六
五 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論的意義	二五
六 辯證法與進化論	三〇
七 生產力的發展與地理環境	三六
八 地理環境與社會的發展	四二
九 物質生活與觀念形態	四七

一〇 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形式的變更.....	五
一一 人類的意志與環境的改變.....	六一
一二 社會心理與社會階層鬥爭.....	六七
一三 現代科學界的新趨勢.....	七三
一四 經濟基礎與文藝.....	八二
一五 思想運動與經濟的發展.....	八六
一六 自由與必然.....	九一
一七 唯物論與目的論.....	一〇〇
辯證法與邏輯（附錄）.....	一〇九
註解.....	一二六
名詞索引.....	一三〇
人名索引.....	一三七

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

一 序言

科學社會主義——這是一個完整的宇宙觀。簡單的說，這是現代的唯物論，這唯物論是現今發展到最高階段的世界觀。這世界觀的基礎是由古希臘德謨克里特（Democritus）^(*)所奠立的，而且一部分是由德氏以前的愛沃尼亞（Ionia）思想家所奠立的。那些思想家的所謂唯物論（Hilosoism）^(註)^(*)實際上也可以說就是原始的唯物論。創造現代唯物論的最主要的功蹟，絲毫不容疑的應歸於馬克思與恩格斯。這個宇宙觀的歷史方面與經濟方面，也就是所謂史的唯物論，以及同牠有關係的對於政治、經濟學任務、方法和範疇與夫對於社會經濟發展，尤其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

（註）承認物質同生活的力量與精神有密切聯繫的希臘的哲學。

種見解的總和，牠們的基本原則差不多完全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發現出來的。馬恩兩氏的前輩，在這些方面的工作，祇能當作搜集材料的一種準備工作，雖然這些材料是很豐富而且很可寶貴的，但是還沒有整理出系統，還沒有成爲一貫的思想，因而牠們的真意義還是沒有爲人家所賞識，爲人家所應用。至於歐美馬恩兩氏的後輩，在這些方面的工作，也不過是關於某一問題，固然常常是很重要的問題，僅有相當成功的研究。因此之故，不但『廣大的讀者羣衆』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深深了解馬恩的哲學學說，就是在那些自命爲馬恩的真正信徒的人們也是不了解的，而且不但在俄國，就是在一切文明國家裏面，往往都把『科學社會主義』這個名詞，祇看作我們在上面剛所說的現代唯物論宇宙觀的兩方面。他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兩方面，祇看作與『唯物論哲學』完全不相關的，而且差不多與它相反的東西。這兩方面，既然被人家從任意的肢解，從牠們同血緣的而且構成牠們的理論基礎的見解總體中取出來，但是不能懸掛在空中。那末對牠們行使這種肢解手術的人們，自然便發生了重新『樹立馬克思主義』的要求，把牠